

##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曹元华 第5期笹川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主任医师

时如白驹穿隙，转眼赴日已是20年了。看到日中医学协会征文的主题，令我思绪万千！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了我什么？给我带来了什么？是成绩？是荣誉？是地位？是职称？是代表金钱的工资？应该说这些都有了，但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予我最最宝贵的是，为我找到了一位影响和感动我一生的导师。

1989年9月，我有幸成为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第五期研修生，在日本厚生省国立多摩研究所（麻风病专业研究所）结识了我的恩师和泉真藏先生，今年他已72岁高龄，但至今仍奋战在马来西亚的麻风防治第一线。

数千年来，麻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麻风患者至今仍倍受世人的百般歧视，国际上亦不例外。然而我的导师和泉先生却毅然地选择了为麻风患者服务这一令人生畏的职业，一干就是43年。

我写此文的目的，不想宣扬他在日本麻风防治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亦不是感激他如何指引我多次走上国际会议的讲台。旨在在敬佩他的为人师表和高尚的品德。旨在敬佩他热爱麻风事业和视患者如亲人的可贵精神，以唤起人们为麻风患者和其它疾病患者献出更多的爱心。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就曾为全世界麻风患者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笹川阳平先生也曾到世界各国考查麻风防治工作，并深入麻风病院慰问麻风患者。

和泉真藏先生立志献身于麻风事业，缘于他高中一年级时看到的一篇关于麻风患者悲惨遭遇的报道，从此他就下决心为解决麻风患者的疾苦而作出自己的努力，他报考医学专业的目的也是将来能为麻风患者直接服务。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东京虎の門病院的外科医生，应该说这是一家在日本颇有名气的医院。当他有了3年执刀经验的“资本”后，他毅然放弃了外科医生这一令日本人都羡慕的职业，离开繁华的东京，只身一人到一座孤岛上的麻风病院去工作。用和泉先生自己的话说：“自从做看了那篇麻风患者悲惨遭遇的报道之后，13年痴心不改”。从此以后，他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成为医学博士，无论是作为国际知名麻风专家还是作为原日本厚生省官员，43年来从未脱离过麻风患者，始终把直接为麻风病人服务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职责。从日本国立多摩研究所退休后，又返聘回香川县国立疗养所大岛青松园（麻风医院），到了规定年龄不能再继续从事麻风工作，于是他又受聘于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在麻风患者多发的海岛上工作。在我的心目中，和泉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不知道在这43年中和泉先生是如何具体为麻风患者服务的，但在我作为第五期研修生和第二期特别研究者期间所遇到的几件事，或许能反映出和泉先生如何对待麻风患者的一斑。有一次一位麻风患者打电话向他询问有关问题，和泉先生中止了正在进行的实验，和患者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从饮食起居到治疗方案，从功能锻炼到今后的工作问题，从放松思想压力到树立乐观人生，俨然象一对亲友在谈心，这样的通话事我遇到过许多次，每次都是这样

不厌其烦，直到对方满意为止。还有一次，一位外国人到实验室找和泉先生，他热情地与来客握手，又亲自为客人冲咖啡，看到客人似乎不太愿意在实验室交谈，就让客人去了他的办公室，1 个多小时才将面带笑容的客人送走。我原以为来者是和泉先生的外国朋友，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外籍麻风患者，是慕名前来求医和咨询的。在我的心目中，和泉先生是一个**视病人如亲人的人**。

1993 年我作为特别研究者第 2 次赴日，和泉先生安排好我的住宿和实验计划后便住进了医院，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我赴日而推迟了早期胃癌手术的日期。当我到医院看望和泉先生时，他的病房里摆满了麻风患者送来的鲜花和花篮，还有大一张签满患者姓名、祝愿他早日康复的心形慰问卡。住院仅 10 多天后的一个晚上，和泉先生来到实验室对我说：“这些天来让你一个人做实验，实在对不起，不过，明天我还是要去京都一天”。看着和泉先生消瘦的面容和干裂的嘴唇，我感动得眼睛有些湿润了，我知道第 2 天是星期四，是和泉先生去看望他病人的日子。原来，和泉先生 1988 年从京都医科大学医学部调到东京国立麻风研究所后，每周四都要去京都一趟，复诊他经手治疗的麻风患者，当天往返的路上就要花 7 个多小时，早出晚归、从未间断，而且这种服务是完全不收费的。因和泉先生手术拆线后仅 3 天，我曾试图劝他是否晚几天再去，但和泉先生说：“那里的病人已等待我两周了，通过这次住院手术，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患者是多么需要医生，我必须去”。为别人而推迟胃癌手术，5 年如一日义务为麻风患者服务，手术出院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他的病人。可以说，为别人他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在我的心目中，泉先生是一个**忘我的人**。

1993 年 5 月，和泉先生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实地考察情况，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麻风研究与国际贡献”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麻风杆菌的传染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些贫穷国家，由于卫生、营养水平等关系，麻风的流行仍很严重，日本的麻风工作者也要为发展中国家麻风的防治作出贡献。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少数人的非难，说和泉先生“夸大了麻风的传染性，从而助长了对麻风的恐惧，日本人应首先考虑本国的患者的利益，不要为讨好东南亚国家而出卖日本患者”等等。和泉先生毫不畏惧地在报刊上据理力争，他写道：面对发展中国家麻风流行的事实，难道能因麻风对日本已不构成威胁，就说麻风杆菌不具有传染性吗？这样做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自私吗？难道为了日本麻风患者的利益就可以损害别国患者的利益吗？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和日本的患者，难道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吗？和泉先生的观点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包括麻风患者的理解和支持。这件事使我感到他的胸怀之宽广。在我的心目中，泉先生是一位医疗战线上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

1990 年 10 月，和泉先生应我们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国，他不是要去游山玩水，而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麻风患者，访问仅有短短的几天，他还是去了安徽和上海的两家麻风医院，向医院领导了解患者的治疗情况，握着患者的手聊天、询问生活和康复情况，俨然是老朋友在叙旧，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患者、翻译和陪同的外事人员。

访问期间，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单位打破以往从不主动安排日本客人去参观“南京日军大屠杀纪念馆”的惯例，由我陪同前往，和泉先生在纪念馆中看得十分仔细，一张图片、一段解说都不放过，在 10 余块象征着集体屠杀中国人的小石碑前，他认真地念着碑文，然后

逐一拍照，我看到了他肃穆的脸和眼角的泪。次日，在我们单位做完学术报告之后，他掏出了前一天晚上写到深夜的中文发言稿，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谈了他的沉痛心情和坚持日中世代友好的决心，当最后他用中文一字一句“中国我爱您，我爱您中国”结束发言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的眼里满是泪花，我在心里说，和泉先生您是一位日中友好的使者，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人。

1998年，我遇到一个疑难病例，该患者可能是日本学者首先报告的“歌舞伎化妆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但要确诊和在杂志上发表，必须有日文文献支持。当时和泉先生已经返聘回香川县国立疗养所工作，疗养所即麻风医院位于偏僻的海岛上，我抱着试探的心情求助于导师，请他帮我查找原始报告和相关文献，没想到10多天后便收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原来为了我需要的资料，和泉先生专程从海岛赶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查找并复印了原始报告和相关文献5篇。有了日文文献的佐证，使患者18年来首次得到确诊，该病例报告也于2000年在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这是除日本外，亚洲皮肤科领域的首例报告。

2007年1月28日是导师的70岁大寿，恰巧我的一位同事在熊本进修，我委托她订购一个大花篮用宅急便送至导师家，我想再怎么忙，70大寿也肯定会在家过生日的，但师母收到鲜花后却又爱又恨地告诉我：“你导师是一个为麻风事业不要命的人，70岁生日仍和马来西亚的麻风患者在一起，我会争取把花养护到他两周后回来”。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在想，和泉真藏先生，您是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予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您是一个**影响和感动我一生的人**。

20年过去了，我已从中青年步入老年，而导师和泉先生也从中老年越过古稀。20年来每逢日本新年和导师的生日我都会寄去贺卡、送上祝福。20年间我们通信不断，友谊逐增。我与导师从20年前互称先生，到后来称兄道弟（每次从日本邮寄资料，都写曹元华学弟收），从当初的师徒关系，到后来成为忘年之交。我也从主治医师成长为教授，从中青年成长为小有成就的学者。这无不得益于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我心目中，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是**日中医学交流之纽带，日中人民世代友好之金桥！**